

希特勒

本书的出版使众多的希特勒传记都显得逊色过时了，它是一部对第三帝国、希特勒研究的划时代著作。
——《泰晤士报》

傲慢

1889-1936

上卷



[英] 伊恩·克肖 著
廖丽玲 方 遒 等译

世界出版社

希 特 勒

傲慢 | 1889—1936
上 卷

作者 [英] 伊恩·克肖
译者 廖丽玲 方 道 孙祥华
陈 巍 曾 云 樊晓东
赖 兴

世界知识出版社

Copyright © 1998 by Ian Kershaw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Penguin Books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5, by World Affair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1 - 2000 - 418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特勒·上卷 / (英) 克肖 (Ian kershaw) 著; 廖丽玲, 方遒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5

ISBN 7 - 5012 - 2543 - 5

I. 希... II. ①克...②廖...③方... III. 希特勒, A. (1889 ~ 1945) — 传记 IV. K835.16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6554 号

希特勒 (上卷)

作 者 [英] 伊恩·克肖
译 者 廖丽玲 方 遒等
策 划 张光勤 王 立
责任编辑 王瑞晴 唐 浒 阮中强 沈中明 陈 平
责任出版 林 琦 车胜春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 王府井大街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7.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印张 970 × 640 毫米 1/16 32 1/4 印张 572 千字 32 面插图
版次印次 2005 年 8 月第一版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仅仅在几年之前我都未曾想过我会动笔写一部希特勒的传记，原因之一是一些极有价值的有关这个独裁者的传记已经问世。早在学生时代我就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过艾伦·布洛克早年的杰作。1973年，约阿西姆·费希特的新作刚一问世我即贪婪地将其通读一遍，并像众人一样对书中显现的文采赞叹不已。我在1989年同意承担这项写作任务时心情极为忐忑不安，其原因正在于对布洛克和费希特所获成就有一种敬畏的感觉。

致使我不敢轻易接受这项任务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部传记从未像我意欲写作的其他作品一样列入我的研究计划。恰恰相反，我对传记这种体裁在一定程度上持反对态度。我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中世纪史开始的，此后我关注的一直是社会史而不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更不要说关注某些具体的人物了。七十年代在德国史学研究中盛行的反传记潮流更加强了我的这种倾向。当我改变方向，转而研究第三帝国史时，我关心的是那个特殊年代德国普通百姓的行为和心态，而不是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的所作所为。我最初的研究课题是“巴伐利亚计划”，在这方面，我的导师马丁·布罗斯扎特的鼓励和鞭策使我受益颇多。当时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研究兴趣：探究纳粹统治时期的舆论和不同政见，考察希特勒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后一项研究势必将我卷入七十年代在德国进行的有关希特勒的激烈辩论之中。但作为一名非德国人，我感兴趣的主要不是希特勒本人以及他的行为和作用，而是当时民众为何认可了希特勒这个人物，为什么他会赢得民心，因此我基本上仍能置身于这场辩论之外。

1979年，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名新手，我有幸参加了〔xii〕在伦敦近郊坎伯兰·洛奇镇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从此之后，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局外人了。德国研究第三帝国史的众多权威人士出席

了这次会议，这些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对希特勒在纳粹统治体制中所起作用的想法有着极大的差异。参加这次会议促使我进一步深入研究德国史学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并就此发表了一篇概述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超越或摒弃在有关希特勒这个纳粹独裁者的传记中已形成的某些看法。显而易见，我对“结构主义者”对纳粹统治的见解持赞同态度。

出于上述原因，我最终从“错误”的方向入手写作这部希特勒的传记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由于对纳粹统治结构以及对希特勒本人在纳粹体制（如果可以称其为“体制”）内部所起作用的不同看法引起我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因此我不得不对希特勒这个人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这种关注还迫使我考虑，一名“结构主义”历史学家写成的希特勒传能否克服或融和巨大的意见分歧。写作这部传记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或许首先应低估而不是夸大某个人——不管这个人多么有权势——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接下来的工作反映了这样一种尝试，即通过写作一部希特勒的传记，将构成人类历史上这一极端重要的历史阶段的个人和非个人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使我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个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将德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的怪异性格，我更感兴趣的是希特勒怎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这个最初根本不可能爬上高位的狂妄之徒怎么能够获得权力，不仅如此，他还将这种权力扩大到无限的程度，以至于众多陆军元帅俯首帖耳、心甘情愿地执行一个前下士的命令，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毫无保留地顺从一个自修者的意旨，而这个人得到人们一致认可的惟一才能只是善于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如果我们在一开始不能断定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从希特勒个人的性格特征中寻找，那么我们就必须主要从德国社会——从形成希特勒这个历史人物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中寻找答案。通过考察发现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并将其与希特勒个人的作用结合起来，从而找出希特勒如何将他的权力扩大到能够

{xiii} 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程度的原因，这就是我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

在写作这部传记及社会史的过程中，除了帮助我找到一种能够将相互矛盾的见解糅和起来的理论之外，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领袖的性格魅力”说。这一学说将造成这种奇特政治统治形式的原因首先归结于“性格魅力”的感知者，也就是说首先归结于社会而不是阿谀奉承者所崇拜的那个人。

自从费希特所写的传记出版以来已有大量从各个角度研究第三帝国历史的一流学术成果面世，这对我尝试写作一部新的希特勒传是极大的鼓励（必须承认，这同时也让我感到沮丧和灰心）。例如，现在

回过头看，在早期出版的传记中几乎没有描述反犹政策及“最后解决”方案的产生等问题，这是十分令人惊讶的。当然，难以确切说明希特勒本人——往往是极隐蔽地——如何走上“曲折的奥斯威辛之路”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过，目前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能够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状况——马利斯·斯坦尔特刚刚出版的重要传记已经着手这样做了。

除了二手资料的增加之外，大量有关希特勒的原始材料的发现也为写作一部新的传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希特勒从1925年纳粹党重建到1933年被任命为第三帝国总理期间发表的演说和文稿已被编成多卷本文集，它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这部文集和他在1924年以前所发表的演说和文稿集合起来可以使我们清晰地描述出希特勒上台之前的思想发展脉络。现在可以利用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是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这部日记的全文最近才被发现，此前它一直被存放在一般人不可接近的莫斯科国家档案馆的玻璃盒子里。戈培尔显然打算日后发表他的日记，因此他在评述希特勒的言论时极为小心谨慎。由于戈培尔的评论非常直接而且颇多，因此它是洞察希特勒的思想和行为的一部至关重要的资料。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视为研究希特勒的思想和计划的一部权威资料——布洛克和费希特依据的主要是这部资料——已被放弃了。我在书中一处也没有引用过赫尔曼·罗西宁编辑的《希特勒演讲集》，这本书现在已毫无权威性可言，最好彻底将其放弃不用。其他一些资料，特别是回忆录，甚至是希特勒在自杀前几个月的“桌边独白”——有关这些谈话的德文原始文本从未被人看到过——也应谨慎对待。将希特勒自我封闭的个性、人际关系的匮乏、不讲规矩的作风、人们对他的极度奉承及他自己煽动起来的人们对他的仇恨等因素与他的亲信随从战后所写的回忆录、所谈的趣闻轶事结合起来考察就可发现，第三帝国政府机构遗留下来的堆成小山一样的文件在许多方面都无助于重现希特勒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他根本比不上他的老对手丘吉尔甚至是斯大林。

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给德国社会，当然也给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千百万人造成了持久的伤害，这丝毫也不令人感到惊讶。但是，希特勒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了影响。我们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希特勒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恶魔。只有了解历史才能知道未来。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如阿道夫·希特勒统治的那个时代重要。

谢菲尔德/曼彻斯特
1998年4月

致 谢

[xv] 一部著作完成之后最让人高兴的是可以公开向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从大的方面或小的方面对这本书的创作提供过帮助的人表示感谢。像本书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得以面世自然更是得益于众多机构和个人的帮助。

我首先要对数家档案馆和图书馆的馆长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们给予我非常专业的帮助，允许我接触馆藏的档案资料，并向我提供了未曾公开的原始档案。这些档案馆和图书馆包括：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波恩）；巴伐利亚州立档案馆各个部门；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柏林档案中心（我在那里得到了前中心主任戴维·马韦尔博士的特殊帮助）；联邦档案馆（科布伦茨）；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研究所（汉堡）；东柏林前马列主义研究所档案馆（民主德国）；奥尔登堡档案馆；慕尼黑档案馆；波茨坦前中央档案馆（民主德国）；英国的英国广播电台档案馆；博斯威克研究院（约克郡）；伦敦和贝尔法斯特公共档案馆；伯明翰大学图书馆（准许我使用张伯伦文件）；伦敦出色的维也纳图书馆（我应当特别感谢馆长戴维·切萨拉尼教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奥地利的林茨档案馆；上奥地利国家档案馆（我要特别感谢杰拉尔德·马克哥特博士）；维也纳国家档案馆；俄罗斯的前特别档案馆，即现在的历史文献档案中心（莫斯科）。

[xvi] 我还要感谢这些档案文件的编辑者和出版者，我从这些档案文件中做了许多摘要，经过版权所有的允许，本书还发表了一些历史照片，对他们我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要对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所长霍斯特·穆勒教授和全体研究人员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任何研究纳粹统治时期历史的人对此都不会感

到惊讶。自从七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在该所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我一直受到他们极为热情的款待。像许多从事 20 世纪德国史研究工作的人一样，我从该所图书馆和档案资料以及研究人员（图书馆员、档案人员）的专业知识中均受益匪浅。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诺贝特·弗赖（最近他已到波鸿的鲁尔大学任教），多年来他和我私交甚笃，此外还有埃尔克·弗勒利希、赫尔曼·格拉默、露莎·格鲁希曼（她让我使用了新编辑出来的有关希特勒受审的部分档案资料）、克劳斯—狄特玛·汉克尔（现住德累斯顿）、赫尔曼·魏斯（他帮助我解决了对某些档案材料的疑问）和汉斯·沃勒尔。非常感谢该研究所的业务经理格奥尔格·马辛格，感谢他在许多场合对我表现出的善意。我同样要感谢研究所档案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他们非常耐心而又卓有效率地解答了我提出的许多问题。

1989 年至 1990 年我对令人赞叹的柏林科学院的访问为我提供了思考、阅读和写作的宝贵时间。在此期间我为写作这部传记做了基础工作，同受过广泛专业训练的学者进行交流使我颇受教益。感谢科学院院长沃尔夫·勒庞尼斯以及他的全体同事，感谢该院图书馆工作人员回答了我提出的无数问题。本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在 1994—1995 年我脱离日常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写成的，为此我要感谢谢菲尔德大学的支持。亚历山大·冯·洪布洛特—施蒂夫腾从 1976 年起就一直对我的研究工作提供慷慨支持，1997 年夏天他出资让我在慕尼黑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核对参考书目的工作，在此期间我的儿子马克也请了一周的假来帮助我。

在本书写作期间，我得到了我的英国、德国、美国出版商极大的（特别耐心的）支持。企鹅出版社的拉维·迈肯达尼（他在好久之前就向我约稿）和西蒙·温德尔（他采用了这部书稿并始终关注着本书的写作情况）是我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鼓励对我至关重要。我还要向制订文献目录的托马斯·韦伯、编撰索引的戴安娜·勒科尔，特别要出色地编辑了文稿的安妮·李表示感谢。在诺顿，唐纳德·拉玛在我修改书稿时所提出的细致而又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是非常贴切的，我极为赞赏他的洞察力。德国出版社的乌尔利希·福尔茨和迈克尔·内尔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对我提供了帮助；纳尔格·拉德马赫（他翻译了正文的大部分）和于尔根·皮特·达勒斯在克利斯托夫·施韦格的协助下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本书的德文翻译工作。德国袖珍本出版社的玛格丽特·凯特勒和安德烈亚·沃尔勒对这项工作极为关心并且一直提供很好的建议。 [xvii]

多年来我的朋友和同事们向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通过讨论或通信、通过鼓励、通过他们自己已出版的著作等方式帮助我形成了

对纳粹时代的看法，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希望这种感谢方式不会显得减少了我对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向杰拉尔德·弗莱明、布丽日特·哈曼、罗纳德·海曼、罗伯特·马勒雷、迈尔·迈克里斯、斯蒂格·莫勒尔、弗里茨·里德里希、基塔·塞利尼、迈克尔·威尔德特和皮特·维特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十分慷慨地向我提供了文件资料，允许我阅读他们尚未出版的著作，就某些翻译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埃伯哈德·杰克尔以其在希特勒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多次向我提供帮助。理查德·伊文思最先向我提出了写作这部传记的建议，尼尔·弗格森建议我将此书分为两卷，在此谨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内尔·伯默尔（谢菲尔德大学俄语和斯拉夫语系），他为我翻译了一篇用捷克语写作的关于希特勒的文章。

我要特别感谢杰里米·诺亚克斯。他在七十年代初发表的下萨克森地区研究著作是促使我考虑研究纳粹德国史的几部著作之一。从那时起他就成为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成为一位杰出的德国现代史学家。他耗费多年心血汇集起来的文件汇编（杰里米·诺亚克斯和杰弗里·普里德汉姆编：《纳粹主义，1919—1945：文件汇编》，4卷本，埃克塞特，1983—1998）是一部有关纳粹统治的英文本原始资料集成（附有出色的评论），它涉及的范围以及数量均超过了任何德文本文件汇编。〔xviii〕在本书各章节中提到的许多资料均可在这套文件汇编中找到。在第13章引用的一份文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的英文译本在杰里米编的文件集中首次发表。这份措辞含糊的文件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对独裁政权运行方式的描述极为清晰。根据这些描述我形成了对希特勒的完整看法。感谢杰里米的文件集，是它让我注意到了这份文件。我还要感谢他以专家的眼光审查了全部文稿。

两位德国学者对我的著作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此我愿向他们特别表示感谢。我曾有幸同现代史研究所所长马丁·布罗斯扎特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专业知识和他对我的鼓励都极大地帮助了我。在他的指导下，七十年代末我在慕尼黑工作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位对我的著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鲁尔大学的汉斯·莫姆森，多年来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经常进行学术交流。我头一次告诉汉斯我要写一部希特勒的传记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样做。”我担心他不同意用传记方式分析希特勒这个人物。但是，尽管我们在如何解释希特勒这个人物等方面存在着方法上的分歧，我仍希望能够发现他对我的观点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对他的学术成就表示敬佩，同时也向他表示我诚挚的感谢。

许多朋友对我的帮助或许比他们能想像到的还要大。这些朋友是

威廉·卡尔、狄克·吉尔里、乔·伯金、约翰·布鲁伊利、乔·哈利森、鲍博·摩尔、弗兰克·奥格曼和马克·罗斯。同样我还要感谢特劳德·斯帕特。

谢菲尔德大学特别是历史系的同事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这对我是极为重要的。我尤其要感谢贝弗莉·伊顿，感谢她在我写作本书的全部过程中，甚至在我开始这项工作之前就给予我的无私帮助和鼓励。

像以往一样，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所做的一切使这项工作得以完成。只有贝蒂、戴维和斯蒂芬知道我应该如何感谢他们。

1998年4月

希特勒画像

[XIV]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忽视甚至歪曲性格魅力的作用，但它明显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只要具有合适的心理和社会条件，它就会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领袖的性格魅力绝不仅仅是一种幻觉——没有人怀疑千百万人相信这种性格魅力。

弗朗兹·纽曼 1942年

20世纪是希特勒的世纪吗？毫无疑问，任何人给这个世纪留下的烙印都不如阿道夫·希特勒的深。其他一些独裁者也曾东征西讨，奴役民众，做尽了恶事，从而在20世纪的历史上留下了洗刷不掉的劣迹，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希特勒那样让许多人丧失良知。在一个“极端主义的时代”仍然有一些政治领导人代表了这个世界积极的价值观，反映了人类的信仰和对未来的期望。罗斯福、丘吉尔、肯尼迪以及最近的曼德拉位于这些人的前列。但希特勒给这个世纪留下的印记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深。

[XX] 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20世纪的一个典型例子，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体现出现代国家的所有诉求，体现出国家的压迫和暴力达到了难以预料的程度，体现出国家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操纵媒体控制和动员民众，体现出在国际关系中史无前例的犬儒主义，体现出极端民族主义的极度危险性；体现出种族至上理论的极大破坏力以及错误利用现代技术和“社会动力”推行种族主义的最终结果。尤为重要的是，它点燃了至今仍在闪闪发光的报警灯塔：它表明一个现代的、发达的、有文化的社会怎样非常迅速地变得如此暴虐，它如何以难以想像的凶残手段征服世界，它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是整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导致了现代文明的崩溃。

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有待回答。在这场灾难中，德国有哪些独特之处？这个时代有哪些独特之处？已经发生的一切是现代文明本身的产

物和特征吗？它们的潜在影响是否仍未发挥出来？

希特勒长达 12 年的统治极大地改变了德国，改变了欧洲，改变了整个世界。希特勒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盖棺定论的人：没有他，历史进程将会不同。希特勒的直接遗产是冷战——德国被一堵墙分成了两半，欧洲被一道铁幕隔开了，世界被两个拥有可以毁灭整个地球的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分裂了。10 年前这场冷战才刚刚结束。他的更加深刻的影响——他给后世带来的道德上的损害——尚未消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他的名字支配的这个世纪带有明显的战争和种族灭绝——希特勒的标记——的特征。因此，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尽可能认真地根据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重新分析塑造出希特勒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以他的名字为象征的野蛮暴政的各种因素仍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认真考察在希特勒统治下，在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的、技术发达的官僚政治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希特勒成为政府首脑后的仅仅几年之内，位于欧洲心脏的这个发达国家即走上了一条最终通向一场种族灭绝战争的道路，这场战争不仅使德国和欧洲被一道铁幕隔成两半，物质上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更重要的是道德上也出现了分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一个肩负民族再生和种族纯洁的意识形态使命的领导集团，一个极为信赖它的领导人，因而朝着这位领导人指引的目标前进的社会，一个训练有素、有能力制定和实施政策——无论这些政策多么不人道——的官僚统治机构，这三者合起来就构成了我们进行分析的出发点。 [xxi]

如果我们仅仅分析希特勒这个人物，而不去进一步考察造成德国和欧洲这场灾难的社会原因，那倒是一件很方便的事。作为 1933 年到 1945 年德国的统治者，希特勒毫无人性的哲学思想在他担任帝国总理前早已被广为传播了。但是，尽管希特勒要对在他的专制统治下所发生的一切负主要的道义上的责任，但个人化的解释不能说明一切事实。可以说希特勒为诠释卡尔·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马克思认为“人创造了历史，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特定的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命运？偶然性历史事件的作用有多大？当时统治德国的那个奇人的行为和动机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一切都有待于调查。简单的回答是行不通的。

写作一部希特勒传绝不是解答上述问题的惟一途径。但是，就像本书各章节试图尝试的那样，这部传记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它也有可能失败。一部传记中的观点存在着潜在的危险，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同书的主题产生共鸣，这很容易演变成同情，甚至还会不自觉地显露出钦佩的痕迹。本书必须处处小心，避免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

传记这种体裁还有一种天然的危险，这就是在解释复杂的历史进程时过分突出个人的作用，过分强调个人在形成和决定重大事件中的影响，从而忽略或降低促使这些事件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避免落入这一陷阱是写作这部传记时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这是一次危险的赌博。描述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是高质量的。15年前所做的一次统计显示这方面的著作已超过1500部。最近搞的一次统计显示有关希特勒的文章已达12万篇。尽管如此，有关这个纳粹领袖的传记，特别是严肃的、有学术价值的传记仍屈指可数。

[xxii] 自从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进入公众视野以来，对他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是直接对立的。例如，有的观点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的脑子里只有一种想法，这就是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进一步扩张德国的疆域；他只想着用种族主义做幌子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与此相反，有的观点认为他在有计划、有预谋地推行一项意识形态计划。这种观点把他看作一名政治骗子，他蒙骗了德国人民，把他们引导到一种无秩序的状态，同时又把他自己“妖魔化”，把他自己装扮成一个神秘莫测的、能决定德国命运的人物。阿尔伯特·斯佩尔是希特勒的建筑师、纳粹德国战时的军工部长，也是第三帝国上层最接近希特勒的人物之一。战争刚一结束，斯佩尔就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魔鬼”。这种观点是危险的，它把1933年至1945年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神秘化，把造成德国和欧洲的大灾难的原因归结为一个魔鬼般人物的专横的狂想。它认为这场灾难起源于一个特殊人物的行为，它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为希特勒意志的表现。

另一种看法则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它否认个人的重要作用，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一个代表大企业及其领袖利益的无足轻重的人。这些大企业领袖像操纵一具木偶一样控制着希特勒。

还有一种观点把希特勒简单地描绘成一个“精神病人”，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这种观点实在是过于肤浅，它根本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复杂的社会为什么要追随一个精神错乱者、一个变态狂走向深渊？

有一种比较复杂的观点认为希特勒确实是“第三帝国的主宰”，或者也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软弱的独裁者”。他是否实际行使着全部的、不受限制的权力？纳粹政权是否建立在一个变化莫测的权力结构的基础之上，而希特勒尽管享有不可否认的声望，却也只不过是这个政权中无人可以取代的支柱？他是否只是一个宣传鼓动家，善于抓

[xxiii]

住到手的机会，但没有任何纲领、计划或设想？

对于希特勒不同看法的争论并不只限于学术界，它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并且有更加意味深长的暗示。当希特勒作为与列宁、斯大林相对立的人物站在历史舞台的时候，一种对布尔什维克和阶级灭绝近乎疯狂的恐惧，使得希特勒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希特勒无疑是邪恶的，但希特勒热衷于社会流动、改善工人的住房、工业现代化、建立社会福利体系、扫清过去的反对特权。总而言之，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现代、更民主的德国社会，然而，其所用的方法却异常残暴。尽管他屠杀犹太人，下重注争夺世界的统治权，但希特勒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想法和行为比当今的很多想法都理智、英明。从这一点来看，希特勒可以被看作是邪恶的，但是他为德国社会发展却是一片热忱，至少他的意图应被视为积极的。

这样的解释并不是对其表示歉意。我们将希特勒描述成一个社会改革者是想解释为什么他可以在社会危机之时得到广泛的青睐。但是不难看出，虽然他的名字总是和对人类的罪行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他在战争未发动之前死去，他可以在德国民族英雄行列中占有很高的位置。

在写作现代人物的传记时，传主的历史地位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德国尤其是这样。希特勒这个人物——同他的政治影响相比，他的个人品质根本谈不上高尚——显然算不上是一个历史巨人，不过他也可以算做一个“反面巨人”，也就是说尽管他没有高尚的品质，不可能跻身于历史巨人之列，但他对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 [XXIV]

完全回避“巨人”问题看来是比较可取的办法。这个问题很容易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因为它容易被人误解，空洞乏味，无关紧要，甚至会变成一种狡辩。说它容易被人误解是因为“巨人”理论往往会以极端的方式将历史进程个人化；说它空洞乏味是因为历史巨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轻浮的，它是一种根据道德甚至是审美判断设定的哲学伦理概念；说它无关紧要是因为不论我们是否打算以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回答希特勒算不算一个巨人的问题，这一问题本身根本难以对第三帝国的恐怖历史做出解释；说它可能会变成一种狡辩是因为只要提出这一问题就难以掩饰对希特勒在某种程度上的崇拜，因为在希特勒身上寻找巨人的痕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将那些直接帮助他上台，帮助他维持政权的人，将给予他的政权巨大支持的德国民众降低为仅仅是给这位“巨人”打杂的无足轻重的人。

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应是“历史巨人”问题，而应该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一个智力如此低下，

一个除了政治生活之外其余都是一片空白，即使在和他的关系密切的纳粹党内也没有人能够洞察其内心的想法的人，一个缺乏爬上高位所需的背景，在成为帝国总理前甚至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人，怎么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历史影响，怎么能够让整个世界屏住呼吸？

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就是错误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希特勒肯定不是智力低下的人，他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他具有迅速抓住问题的实质的能力，这一点不仅给他周围那些对他谄媚奉承的追随者，而且给那些冷酷无情、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即使是他的政敌也承认他的语言才能。在 20 世纪的国家领袖中，他肯定不是惟一个缺乏个性、知识浅薄同时又具有高超的政治手腕的人。我们再不要像大多数他的同时代人一样走入全面低估他的能力的误区。

此外，出身卑微而爬上权力顶峰的绝不仅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近代史上拿破仑是第一人，尽管他是从重要的军事岗位（在军队中希特勒的军阶只不过是一个下士）逐级升迁上来，而且在指挥岗位上战功显赫，他的智力和人格魅力也远远超过希特勒。到了 20 世纪，平民出身而成为政治和社会精英，进而爬上权力顶峰的可能性较以前增加了，即便如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仍属凤毛麟角，而且这种人往往是在政治动荡时期——而不是在稳定的民主制度下——从革命运动领导人中（如斯大林、毛泽东或卡斯特罗）产生的。

如果希特勒从一个无名之辈爬上权力顶峰并不是一个特例，那就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事实已经证明，希特勒是一个笼罩在一片迷雾中的谜一般的人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他的私生活是一片空白。正如人们经常说的那样，他可以被归入“没落人物”之列。这一判断中可能有一些傲慢的因素，即看不起这个粗俗不堪、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暴发户，一个对一切事物都持玩世不恭态度的自命不凡的家伙，一个没有文化却又自以为是的文化评判家。希特勒个人品行上的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私人生活、自己的出身背景遮遮掩掩造成的。神秘和超然是他的性格特征，也是他的政治行为特征。这些特征在政治上对他极为重要，他有意识地将它们树立起来，从而加重了环绕在他身上的神秘色彩。即便如此，除了政治之外，希特勒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空虚的。拿破仑、俾斯麦、丘吉尔、肯尼迪等人除了公共生活外，他们的私生活也是很充实的。

如果一部传记描述的人物没有私生活，或除了其本人参与其中的政治事件外没有个人的历史，那它显然是有缺陷的。但是，只有在私生活对公共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这些缺陷才能被称为缺陷。就希特勒而言，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希特勒没有“私生活”。当然，他

可以欣赏那些逃避现实的电影，每天散步去伯格霍夫的茶馆，远离柏林的政府机关，在阿尔卑斯山过田园生活。但这是一种空虚的生活。这并不是说他的“私生活”已成为他扮演公众人物形象的一部分。恰恰相反，他的私生活非常保密，以致德国人民直到第三帝国灭亡后才知知道还有爱娃·勃劳恩这样一个人。不仅如此，希特勒将自己的公众职务“个人化”了。“私人”和“公共”完全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希特勒的存在已归结为他扮演的“元首”角色。

从这一角度看，这部传记的任务就比较明确了。它关注的重点不是希特勒个人，而是他的权力特征——元首的权力。

这种权力只有一部分出自希特勒本人，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一种社会产物——是他的同胞赋予他的一种社会期待的产物。这并不是说在扩张权力的过程中希特勒个人的行为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的权力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不应被看作是“个人”的特殊标志，而应被看作是他作为元首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有在其他人犯错误时才会起作用。因此，为了解释他的权力，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其他人——而不是希特勒本人——的行为。

希特勒的权力是奇特的。他并没有把自己对权力的要求建立在他作为一名政党领袖的地位上。他获取权力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负有拯救德国的历史使命。换句话说，他的权力建立在“性格魅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制度之上。它依赖于别人能够从他身上看到“英雄”品质。他们看到了这些品质，或许他本人事先也并不知道他具备这样的品质。

作为当代最杰出的纳粹现象分析家，弗朗兹·纽曼这样写道：“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忽视甚至歪曲性格魅力的作用，但它明显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只要有合适的心理和社会条件，它就会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领袖的性格魅力绝不仅仅是一种幻觉——没有人怀疑千百万人相信这种性格魅力。”希特勒个人在扩张权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们可能会问，如果政府首脑不是希特勒，由希姆莱和党卫队保安处控制的那样一个恐怖的警察国家可能建立起来吗？如果换了另外一位领导人，即便是一位独裁者，德国在30年代末还会发动一场席卷整个欧洲战争吗？如果是另外一位国家元首领导，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必然要发生的）是否会发展到种族灭绝的地步？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是“否”，或者至少是“极不可能”。不管外部条件如何，希特勒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希特勒行使的权力高度个人化，这一点甚至使那些精明练达的人——教士、知识分子、外交官、来访的贵宾——也感到惊讶。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并不认同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屋向群情激昂的纳粹党徒们发泄的那种情绪。但是，由于希特勒拥有帝国总理的权威，拥有

众多崇拜者的支持，宣传机器又给他戴上了伟大领袖的光环，因此，这些既不天真幼稚，也不容易轻信受骗的人对其印象深刻也就不足为奇了。希特勒所拥有的权力也是他的走卒——比他低一级的纳粹领导人、他的亲信随从、纳粹党的地方党部首领——在1945年4月底纳粹政权崩溃之前对他言听计从的原因。权力的神秘性肯定也是如此众多的妇女（特别是年龄比他小得多的妇女）把他看作男性的象征——尽管在我们看来他一点也不性感——有几个甚至试图为他自杀的原因。

因此，撰写希特勒的历史必须是撰写他的权力历史——他如何获得权力，他的权力的特征是什么，他如何行使权力，他如何能够将权力扩大到不受制度约束的程度，抵制他的权力的力量为什么如此软弱，等等。但是，这些问题应该从德国社会，而不仅仅从希特勒身上寻找答案。

没有必要贬低希特勒根深蒂固的性格特征对他获得和行使权力所起的作用。专心致志、不屈不挠、冷酷无情地抛弃一切妨碍他实现目的的东西、带有玩世不恭色彩的机敏、敢于冒险的赌徒本性，这些因素合起来决定了他的权力的性质。权力是希特勒的春药。权力成为希特勒这个自大狂早年漫无目标的生活中的目标，它为希特勒备受挫折的前半生——艺术家梦想的破灭、因社会地位低下而被迫住在维也纳简陋的小客栈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革命使他的一切面临崩溃——提供了补偿。权力成为他所追求的惟一目标。一位目光敏捷的观察家早在德国战胜法国之前就评论道：“希特勒是一个典型的有自杀倾向的人。除了他的自我之外，他不受任何约束。他是一个除了自己以外谁都不爱的人……因此他可以肆无忌惮地维护和扩大他的权力，在他看来，丧失权力就是死亡。”对巨大权力的渴求造成了无穷无尽的对领土扩张的贪婪，最终演化成一场试图垄断整个欧洲大陆进而霸占整个世界的赌博。对权力的无情追逐永不满足，永不愿意受到限制。这种权力扩张不可避免地要建筑在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由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限制希特勒的权力，它的无限膨胀最终必将导致第三帝国的灭亡，这和他内心深处的自杀倾向倒是十分相称。

尽管希特勒狂热地追求权力，但他并不是为权力而权力，这种权力有其自身的内容和含义。希特勒不仅仅是一个宣传家，或一个幕后操纵者，一个鼓动者。这三者他都是，但他更是一个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的理论家，一个激进分子中的激进分子，他的“世界观”——尽管我们十分厌恶——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他依据这种“世界观”对德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弊病做出了完整的解释并列出了根除这些弊病的办法。从20年代起直到他在地下室自杀，他一直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世界观”。正是这种“世界观”致使他采取了国家民族赎罪的路线，而没有采